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表现形式和构建路径

Theoretical Basis,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 and Shaping Path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孙铭珠¹,尹志华^{2,3}
SUN Ming - zhu¹,YIN Zhi - hua^{2,3}

摘 要: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教育这一相对微观的领域探讨了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表现形式和构建路径。研究表明,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共生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表现形式包括精神、价值、行为和结果四个方面,分别体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在精神层面唤醒体育教师的内在责任意识、在价值层面帮助体育教师树立发展观、在行为层面搭建体育教师的合作平台、在结果层面形成体育教师共赢的局面是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教师;理论基础;表现形式;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2808(2022)01 - 0067 - 08

Abstract:Based o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which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is paper used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discuss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 and shaping path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physical education (PE) teacher in the relative microcosmic field of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PE teacher included social symbiosis theory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he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 included four aspects of spirit, value, behavior and result,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 - win; wakes up the inner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PE teachers at the spiritual level, helps PE teachers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t the value level, builds the cooperation platform of PE teachers at the behavior level, and forms a win - win situation of PE teachers at the result level are probably the paths of shap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PE teacher.

Key words: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PE teacher; Theoretical basis;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 Shaping path

收稿日期:2020 - 10 - 21;修回日期:2021 - 04 - 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6CTY013)。
作者简介:孙铭珠(1988 -),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训练。
通信作者:尹志华(1987 -),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作者单位: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体育教学部,上海 201620; 2.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3. 清华大学 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4

共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1],但人类社会以何种形式共生并和谐相处是世界难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探寻如何主导世界秩序的方案,但频发的世界危机表明探索并不成功。中国基于自身实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愿景。在此背景下,也掀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内外研究热潮^[2]。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各国一起共同面对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气候、难民等领域的世界难题,旨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现共赢共享^[3]。由此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幸福生活。由于人类存在种族、民族、地域、国家或地区等不同类型划分,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的体现提供了多种可能,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化可以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如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但当前有关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更多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较少涉及微观层次。

众所周知,教师是人类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化人类、促进人类文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体育教师作为教师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健康的儿童青少年重任,但当前其专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体育教师严重边缘化^[4],对专业身份认同模糊与困惑^[5];初任体育教师专业自主性较差,教学科研意识淡薄^[6];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发展根基薄弱、缺乏研究意识和科研能力等^[7]。这些问题是国内外存在的普遍难题,凸显了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乏力。而当前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青少年儿童健康发展提出的殷切希望,都需要高质量的体育教师。基于此,本文试图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细化至体育教师领域,分析构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背景,提出具体内涵和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与建构路径,希望能够为解决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促进命运共同改变提供启发。

1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背景

1.1 全球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下降凸显体育教师的“信任危机”

世界各国体育活动参与水平下降幅度触目惊

心,在过去的44年美国人的身体活动就下降了32%,照此趋势到2030年下降率将达到46%。而英国人的身体活动在过去的44年下降了20%,照此趋势到2030年下降率将达到35%^[8]。而在上述人群中,青少年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下降更加明显,因而引发的肥胖、抑郁、焦虑、社交恐惧等问题更加严重,也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众所周知,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发展,因而改善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是各国的重要工作。虽然引起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水平下降的原因很多,如遗传、营养、卫生、环境、体育活动等,但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学校体育开展不力。也就是说,当前全球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水平的低下,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执行者承担着巨大责任,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因此,世界各国体育教师如何有效提升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水平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共性问题。

1.2 全球面临的大规模公共健康危机呼唤体育教师发挥作用

从SARS、埃博拉到当前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可以看出全球正在面临着大规模且愈演愈烈的公共健康危机。在传统观念中,似乎公共健康危机主要是医学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比,公共健康危机更多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健康技能等因素有关,而背后凸显的是健康素养的极度缺失。实际上,成人健康素养的缺乏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因此我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崔允漷教授指出,十二年基础教育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洗手、戴口罩以及做好日常卫生防护工作,那些耳熟能详的“注意个人卫生”“不要乱丢垃圾”等口号也并未内化为个体行为^[9]。从当前国际趋势来看,西方国家更是如此,“喝消毒水抗疫”的闹剧表明健康素养缺失是全球问题。基于此,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的爆发使得在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学校期间提升健康素养成为基本诉求,这呼唤着体育教师在其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体育教师需要从传统的“教运动项目”的教师转向全面培养学生健康素养的专业工作者^[10];另一方面,体育教师也需要在面临公共健康危机时,参与基础性防疫、消毒、健康传播与干预等工作。这是全球体育教师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重大挑战。

1.3 体育教师边缘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亟需改变

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大量研究表明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边缘化现象较为严重^[11]。早在1975年,Hendry等人就指出,教育场域中的

边缘化是一种角色或地位,即体育相对于那些主要学科而言是次要的。之所以教文化课的那些同事和领导认为体育教师地位较低,原因是体育学科的非学术性。研究指出,同事疏远体育教师的原因包括职责、工作场所和穿着。在工作职责方面,其他学科教师都在教室内传授学术性知识,而体育教师则在运动场进行大量“看似简单”的身体活动;在工作场所方面,体育馆一般都远离学校中心,这使得体育教师很少能够出现在公众眼中,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参与很多社会交往活动。在穿着方面,与衣着衬衫、打领带、穿西裤和皮鞋的文化课教师相比,穿着网球鞋、短裤、T恤的体育教师被认为没文化和不够专业^[12]。体育教师边缘化而导致的低社会地位问题在东西方国家均是如此,在知识精英时代越来越明显,这一难以消解的问题使得体育教师的专业性被矮化甚至被“污名化”,并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2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当今世界,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亟须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13],体育教师所面临的全球挑战同样也需要体育教师形成命运共同体来积极面对。

2.1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人的聚集和结合而组成的一种“联结体”。关于其内涵,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广义界定“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有学者结合2014年国际社会联盟的进一步解释给出了清晰定义,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它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条件下,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其实践归宿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14],而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领域的细化与体现。结合习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及学者解释,本文认为“教师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共同指向性质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它强调不同类型教师在多种情境中的和平并存,在追求自身专业发展的同时,谋

求教师共同发展和解决普遍难题,进而改变教师命运”,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是对教师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细化,其既具有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属性,又呈现出与其他学科教师命运共同体不同的特征。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在内涵上是指当前时代背景下新型义利观在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体现,外延上体现为在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核心理念指导下,通过多种表现形式而保障体育教师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教师群体特性,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具有专业性、包容性、普适性、现代性、共生性等特点。其中,专业性主要是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是由一群具有高度专业化的人群组成,其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基于其所在专业实践性而展开;包容性是指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内部人人平等,指向所有体育教师个体;普适性是指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任何地域、层次的体育教师都将受益;现代性是指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下所形成的一种亚共同体,体现了现代人类发展的最新意识;共生性是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特点,即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将共同面对、分析、解决难题,共同实现生命成长。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与过去所提出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相比,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理论出发点 and 层次都更高,是在专业共同体基础上的转型、变革与超越。也就是说,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更多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是一种指向日常工作的松散组合,而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则肇基于人类命运的高度,为了解决该群体所面临的全球共性难题而提出的统一体。

2.2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2.2.1 社会共生理论 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首次提出了共生的概念,即“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但这一概念引起了争议,因为如寄生、腐生等现象也符合这一定义的范畴。基于此,德贝里又对概念进行了完善。后来,斯格特又进一步对共生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的程度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并不是一方依赖另一方的关系。而后,格瑞德、戴维斯、斯克堪亚平等西方生物学家又对共生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和修订,并逐渐在生物学领域形成了学说。实际上,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夫妻、雇主与雇员、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企业与

企业等^[15],从而使得共生理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而形成了社会共生理论。

在社会科学领域,共生理论的核心在于共存、互赢和互利。相互共生的群体或者个体虽然可能存在着某些共生的价值观或实践经验,但其异质性即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双方之间有了相互依存的可能性。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甚至指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但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又必须进行相互合作^[16]。法律为人的共生提供了基本准则,而社会本身的发展则推动了共生的调和。从胡守钧教授的社会共生理论拓展开去,到微观的体育教育领域,体育教师相互之间实际上也呈现出共生关系,其教学、训练、竞赛、科研等工作开展都离不开他人协助。以新入职的青年体育教师为例,做好体育教学工作是其立足的根本。但他们在实施体育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初入工作岗位对教学流程、学生学情等不熟悉,教学技艺不够娴熟,同时还存在着与同入职其他年轻体育教师之间的竞争。此时,如果他们不寻求与带教老师、同事、学生等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谐共生,获得他们的鼎力支持,则会更加艰难。总之,体育教师在学校场域中面临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困境,这些困境的改善需要通过构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而实现更好地共生的方式来解决。

2.2.2 社会建构理论 对于发展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悲观决定论与积极改造论。前者认为命运是由上天主宰,人类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该理论对人类发展影响非常消极。积极改造论则承认人在自身命运改变中的能动性,认为人的命运可以改变甚至重新建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理论,而这也是当今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正如 Burr 指出的那样,社会建构理论主张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持批评态度;知识具有历史和文化的确定性;知识与社会过程相联系;知识与社会行为相联系^[17]。这里所指的知识并非完全是书本知识,实际上关涉到人类的命运,因为人类命运的发展本身就和各种知识的形成交织在一起。社会建构论认为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不是社会结构的存在物,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建构而形成的。

从社会建构理论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否定自我、构造自我的存在范式。体育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其专业成长的过程实则是一种建构的过程。传统的那种大学毕业之后就不用再学习

的老套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教师职业,教师通过不断的建构而提升综合能力,改变自我境遇,从而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全球体育教师所面临的学生身体活动水平下降,公共健康危机,以及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学校对体育不重视、他人的职业偏见、长期的日晒雨淋、同事间的关系紧张等边缘化现象,使得他们悲观的认为体育教师是无所作为的职业,因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甚至还煽动同事与自己共同“抵制”业已形成的学校文化。实际上,部分体育教师的这种悲观决定论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致使他们越来越不被重视。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让体育教师们明白,命运不仅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还是可以自我选择和建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来建构。

3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表现形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体现在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领域,则具体化为精神、价值、行为和结果等相应表现形式,即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外在面貌。

3.1 精神表现形式:和平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康德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滕尼斯的“精神共同体”,还是哈贝马斯的“世界共同体”,或从哲学、政治与社会,或从文化、经济与环境,广泛思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我”与“他者”之间共在的可能性,无不闪烁着思想巨人的智慧之光。而这种“共在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和平共处^[18]。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公共产品”,具有利益共生、情感共鸣和责任共担的内在意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精神表现形式的“和平”奠定了思想基础,即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向所有共同体内部所有体育教师的“精神公共产品”,他们首先必须要在精神的意识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达成共同的精神指向,形成共同的精神支柱,造就共同的精神观念等。实际上,当前一些体育教师并未在精神上形成“和平”,比如火爆脾气导致的相互争执、场地和器材冲突导致的相互指责、学校运动训练既得利益导致的相互拆台等现象并不鲜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他们自己并无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意识密切相关。通过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要在精神层面引导体育教师形成高度统一的和谐相处的观念,要改变外在的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和“不好相处”的刻板印象,要超越血缘亲情而形成精神统一体,这就需要共同体要精心打造“核心价值观”,真正赢得每个成员的接纳和深度认同。实际上,真正支撑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源远流长的是精神支柱,而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所有体育教师能够共享的“体育人智慧”,成员在这种“智慧”中经过不断地浸润而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看作是共同体的一员,而不再将自己当作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3.2 价值表现形式:发展

价值观是人类对历史与未来的深度思考,是对人性导向的深刻剖析,决定着人生道路和发展结果。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表现形式体现为发展,这是由共同体成员的意识所决定的。习总书记于2015年9月27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19]。由此可见,所有组成命运共同体的体育教师,必须要秉持发展的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齐心协力、共同进步。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价值表现形式的发展蕴含两层意义:一是所有成员的价值观均指向发展,而不是在运动场上“混日子”。为何要构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让体育教师能够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能够在学校场域中脱颖而出而受到重视,不再被视为可有可无的“闲杂人员”。所以,在共同体内部,发展是基本的价值取向,那些“得过且过”的成员终将被共同体所抛弃或者同化。二是所有成员的价值观均指向协调统一的发展。实际上,仅仅有指向发展的价值观还不够,因为不同成员如果只是基于自身的情况来考虑,其发展的方式、维度、时间、载体均千差万别,这种内部的不一致只会导致“内耗”的增加而有助于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进步。因此,进入命运共同体就意味着体育教师们进入了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高度协调一致的组织,所有成员都要在包容和尊重的前提下在价值观层面达成共同的发展方略。

3.3 行为表现形式:合作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些体育教师已取得了较好成绩,而有些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前者在无形中所处的“轴心”地位和后者所处的“依附”地位决定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轴心”地位成员的“自我”意识比较

浓厚且很难消除;“依附”地位成员在“权威”面前通常表现出“自我缺失”窘态而缺乏自信^[20],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从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来看,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他们基于平等的地位而表现出指向共同进步的合作行为。如若在共同体内部还存在着“不合作”“假合作”“伪合作”等现象,那么这一共同体终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命运共同体内成员的合作主要表现为“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而这一思想演化到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真正的教师合作必须要具备主体的意愿、可分解的任务、有共享的规则、有互惠的效益等要素^[21]。因此,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内部的成员首先要从主体的角度在情感态度、心理相容度与认同感上达成一致,这种主体意愿不是来自于行政命令,而是来自于个体内心;其次,要给每一位体育教师分配可操作的任务,而这种任务是基于合作的而不是彼此之间独立展开,清晰高效的分工是合作的基础;三是要在所有体育教师之间形成可以共享的合作规则,包括时间、地点、程序、技巧、形式、文化、环境等,以保证共同体成员处于有序状态;四是要在共同体成员内部形成互惠的要素,这种互惠既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而这一点最终指向本文所言的结果表现形式。

3.4 结果表现形式:共赢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所有成员共赢,这既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符合教师发展目标。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共赢结果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思维层面共赢。当前很多体育教师之所以被外界误认为“不够有文化”,关键原因还在于“思维缺乏”与“身体强壮”形成鲜明对比,这甚至迫使一些学者提出了“体育文化人”的说法^[22]。思维层面的共赢主要体现为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体而形成积极、向上、统一、协调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思维;二是行动层面共赢,即所有体育教师在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分享、共同使用一些技巧与方法,如体育课堂教学方法技巧、学校体育管理策略、与不同学生交流的方法、与其他学科教师开展合作的途径等,而这些都将体现在外部的行为上。通过行为层面共赢,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将获得更大收益;三是成就层面共赢。与其他学科主要用中高考成绩来体现成就相比,体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师的成就很难进入领导的“法眼”,因此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成员必须要思考如何通过在成就层面的共赢来产生大

的反响,从而赢得对外人对体育教师的刮目相看。比如,通过大型的学生体育健康促进活动而赢得媒体赞誉、在大型公共健康危机中积极发挥体育人的独特作用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某个体育教师可以完成,这需要命运共同体内部的体育教师一起合作。通过成就层面的共赢,并最终改变体育教师在学校场域中“一眼望到头”的命运。

4 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基于社会共生理论所倡导的共存、互赢、互利,以及社会建构理论所倡导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否定自我、构造自我的理论基点,为了更好地帮助体育教师形成命运共同体,在精神、价值、行为和结果四个方面达成相应表现形式,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4.1 在精神层面唤醒体育教师的内在责任意识

长久以来,体育教师已经形成了一些积重难返的信念,比如“体育教师不重要,也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员”“体育教师没文化”“现实情况决定了体育教师的命运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学生是否健康不是体育教师能够决定的”等,这些信念在全世界各国体育教师中都非常常见,而且根深蒂固。试想,如果当事者自身都秉持这样的信念,那又何谈外界的认可?实际上,体育教师所秉持的这种信念,其实质是在精神层面缺乏责任意识的表现。因此,在构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时,首先要试图唤醒体育教师的内在责任意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内在责任意识是心灵力量和教育力量的根本源泉,是人类所秉持的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23]。体育教师内在责任意识的缺失,使得他们将体育教学这一本质工作当成了简单的技术性操作行为,在教育活动中仅剩下“肢体的活动”而没有“意识的觉醒”。

在精神层面唤醒体育教师的内在责任意识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虑:一是要帮助体育教师重塑对职业的认知,通过反思、读经典书、学优秀前辈的光荣事迹等方式可以很好地唤醒他们内心沉睡的责任意识,提高对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形成良好的体育教师职业精神。这是一个体育教师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否定自我的过程,是体育教师自我蜕变的关键阶段。当然,这只是构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作为专业人员的基本要求;二是要在具备职业精神的基础上,要从“本土立场和观念”向“全球立场和观念”的责任观转变。也就是说,在当前全球学生身体活动水平下降、公共健康危机横行和教师边缘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体育教师的

责任意识不仅在于促进自身发展,更应该要积极站在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培育自己在解决全球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等方面的责任意识,具备强烈的积极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和形成“全球方案”的责任观。

4.2 在价值层面帮助体育教师树立发展观

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主要表示某类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生价值的本原含义应该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之上,即人能够满足其他个体或群体需要的程度,这种程度越大,表示人生价值越大。因此可以看出,只有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关系中,人生才能表现出应有的价值,即人生是否有价值,关键在于个体能否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以及社会需要^[24]。对于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个体而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要在最高层面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价值不会主动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的过程来实现,因此应该在价值层面帮助体育教师树立发展观。

帮助体育教师树立发展观的过程,本质上是促进体育教师从“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的过程。在传统的观念中,人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即任何职业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人具备自私自利的本性,所有的决策都是经过理性思考做出的。反观体育教师的生存境遇,“同工不同酬”“领导不重视”“职业无发展前途”等言语频繁出现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这种“经济人”的发展思维很实在,但长期纠结于这些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体育教师高度的提升。而“道德人”的要求则需要体育教师要摒弃以自我利益达成为出发点的局限,站在为促进人类健康发展,提升学生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的角度予以考虑。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需要面对的全球共性问题,则需要体育教师从“道德人”的角度出发,树立共同发展、共同解决典型问题的发展观。

4.3 在行为层面搭建体育教师的合作平台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会经历三种形式,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的“本源共同体”)、虚假的或虚幻的共同体(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真实的或真正的共同体(表现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25]。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命运共同体即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一种基于共产主义思想而为了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强调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对话和交流而实现

合作。基于此,如果要实现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要为体育教师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相互学习、相互理解、消除偏见和寻求共识。

搭建体育教师的合作平台,需要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在宏观层面需要世界各国在推动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时,在有意识地构建包括体育教师在内的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国际教育交流方案签署时做好规划设计。比如,在体育对外合作交流中,增加体育教师专项外派交流计划,针对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降低、体育教育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共同合作开发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干预模式,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公益性组织联合开发一些体育教师国际合作计划等;其次,在国家层面,教育行政部门需要为搭建体育教师的合作平台做好制度保障。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专门出台针对体育教师合作的规章制度,在各类项目申报、奖励评审和人才计划中予以渗透;第三,在体育教师个人层面,需要提高站位,立足于体育教师面临的国际共性问题并结合自身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主动寻求合作的资源与平台,如主动申请参与国际合作交流计划,利用现有的名师工作室搭建不同层次的体育教师合作交流平台等。合作平台的搭建,为体育教师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共存、共生、互利和共赢奠定了基础。

4.4 在结果层面形成体育教师共赢的局面

西方社会常用“自我”和“他者”的两分法来处理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二元对立论的思维使得西方各国的文明、和平与长治久安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客体主体化”过程,这很难兼顾西方各国之间国情、民情和价值观差异的现实情况,尤其是美国总是打着普适性的价值观旗号来颐指气使他国,这导致了国际社会冲突不断且难以消除的根本问题^[26]。实际上,西方国家的这种问题处理思维存在两重困境,一是不直接面临现实问题,而是寻求虚无缥缈的普适性价值观;二是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未从共生、共存而共赢的命运共同体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借鉴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教训,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形塑,需要在结果层面形成共赢局面。

如前所述,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结果共赢包括思维、行动和成就层面的共赢,这些方面的取得都是建立于精神、价值和行为层面之上。要形成共赢的结果,一方面要求体育教师要有明确的共赢目标,在参与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确立清晰的达成目标。比如,基于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型公共健康危

机,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应以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最大限度发挥体育在抵抗疫情中的独特作用为目标,并将这些达成目标的经验及时分享给国内外的体育教师。另一方面,也要对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成员形成的共赢结果予以大力宣传,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型社交媒体进行正面引导,以更好地发挥体育教师在解决共性问题中的示范作用。此外,共赢的结果还需要有包容的精神,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强盛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歪曲事实的方式进行多维打压。作为体育教师,在形成命运共同体而解决体育教师面临的各类问题过程中,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因此需要以包容和共生的心态积极面对。

5 结 语

中国步入了新时代,而新时代体育教师的发展应该要站在更加广阔的视角进行审视,从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的角度进行推进。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体育教育领域的细化和落实,其衍生背景包括体育教师面临的信任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和边缘化危机。作为一种整体上促进体育教师发展的方案,社会共生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精神、价值、行为和结果四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对应四个方面表现所强调的责任意识唤醒、发展观树立、合作平台搭建和局面共赢,构成了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可能路径。在未来,体育教师命运共同体应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形成更加具体的行动方案,展现出有体育特色的共同体气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和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 蔡亮. 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J]. 社会科学,2014,36(4):22-31.
- [2] 宋婧琳,张华波.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38(5):198-208.
- [3]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7-01-20.
- [4] Karen Lux, Bryan McCullick. How One Exceptional Teacher Navigated Her Working Environment as the Teacher of a Marginal Subject [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

- tion, 2011, 30(4), 358-374.
- [5] 邵雪梅. 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其出路[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9): 46-49.
 - [6] 董国永, 王健, 翟寅飞, 等. 我国中小学初任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J]. 体育学刊, 2015, 22(4): 76-82.
 - [7] 郭敏刚, 王健. 我国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的现状、问题及转变策略[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40(4): 85-90.
 - [8] 季浏, 钟秉枢.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6-27.
 - [9] 尹志华, 张古月, 孙铭珠. 关照健康: 关照健康: 重大疫情下体育与健康课程面临的挑战、责任和未来转向[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20, 36(2): 20-25.
 - [10] 尹志华, 贾于宁, 孙铭珠,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建设的挑战与治理策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 43(3): 142-148.
 - [11] Barbara Tyree Smith, Grace Goc Karp. Adapting to Marginalization in a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1996, 16(1): 30-47.
 - [12] 尹志华, 毛丽红, 孙铭珠, 等. 20世纪晚期社会学视域下体育教师研究的热点综述与启示[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5): 100-105.
 - [13] 吴寒天, 阎光才. 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J]. 探索与争鸣, 2019(9): 149-157.
 - [14] 李爱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2): 96-102.
 - [15] 杨玲丽. 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J]. 社会科学论坛, 2010(16): 149-157.
 - [16]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17] Burr, V.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M]. London: Sage, 1995: 2-8.
 - [18] 赵红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之思[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4(6): 16-20.
 - [19] 习近平.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27.
 - [20] 尚力沛, 程传银, 赵富学. 论体育教师文化自信的内涵、现实意义与提升路径[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20, 36(1): 62-66.
 - [21] 崔允灏, 郑东辉. 论指向专业发展的教师合作[J]. 教育研究, 2008(6): 78-83.
 - [22] 白晋湘, 李洪雄, 张小林. 基于协同学理论背景下湖湘体育文化发展与体育湘军成长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5): 6-10.
 - [23] 肖川. 教育信念确立的基石[N]. 中国教育报, 2016-09-16.
 - [24] 李玉栋. 教师人生价值及其实现的经济学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36(25): 34-38.
 - [25] 李爱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2): 96-102.
 - [26] Xing Li, Timothy Shaw.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and Riding Tiger Dilemmas: China'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Economy[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4, 19(1): 69-93.